

【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社会工作发展的社会逻辑*

——一个科学社会学的分析框架

刘 振

摘 要:社会工作引入中国已有百年之久,其间经历了数次跌宕起伏。从科学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社会工作的百年变迁,可以把制度、行动者、社会需要视为三种影响因素,建构出一个“需要—结构”的社会工作发展分析框架,亦即社会工作发展的影响机制。社会工作的发展受到结构性(制度和行动者)因素的直接影响,而社会需要是社会工作发展的内在动因。社会工作的百年发展历程正是在“需要与结构”的张力下得以展开。当社会需要和社会结构相吻合时,社会工作会得到快速、持续的发展;当二者相互抵触时,社会工作则处于茫然与消退的状态。

关键词:社会工作;科学社会学;需要—结构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1)01-0080-06

时至今日,社会工作已在我国跨越了一个世纪的历史长河。这期间社会工作为民国时期的社会建设和抗战救援提供了支持,遭遇了1952年学科调整后36年的“断裂”,经历了1987年“马甸会议”后的复兴与重建,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后迎来了全面快速发展的“春天”。^①如今社会工作已经成为推进我国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促进共享发展的重要力量。可以说,中国社会工作经历了百年的跌宕起伏,其成败兴衰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么,是什么影响着社会工作的百年变迁,使其几经沉浮的同时又获得了今日的发展?本文将社会工作视为一门科学,尝试基于科学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探究其百年变迁背后的影响机制,以期对当下的社会工作发展有所启示。

一、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一个科学社会学的争议

当代科学社会学起始于一种与“科学—社会”相关联的认识论前提,即任何一门科学都沉浸于

“社会”的海洋之中,其生产、发展乃至衰亡都与“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在科学社会学不同的流派看来,社会性因素对于科学的影响方式有所不同。质言之,科学与社会的“关联纽带”各有差异。

1. 默顿学派: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科学

1938年,默顿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出版标志着科学社会学的诞生。在这本书中,默顿关注现代科学在英国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土壤,试图把科学视为一种与文化、经济和军事等同的社会体制^②。在默顿看来,英国科学的迅速崛起与它成长的特定文化背景——清教主义(新教伦理)有着某种因果关系^③;以禁欲和理性为基础的清教主义促成了现代科学在英国的产生;经济、军事和技术上的需要促进了科学研究活动的开展,此即著名的“默顿命题”。这项关于17世纪英格兰科学和其他社会制度相互依存关系的经验研究明确指出,科学活动交替变化的性质和程度因不同社会而有所不同,取决于该社会的科学状况以

收稿日期:2020-06-30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中国社会工作学科史研究”(20YJC84002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城市社区社会工作理论创新及整合行动体系构建研究”(17CSH051)。

作者简介:刘振,男,天津理工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社会工作学博士(天津 300380)。

及该社会的经济、政治、宗教、军事一类的体制制度状况。^④沿此思路,科学社会学逐渐形成了一种将科学视为静态制度结构、研究科学与周围社会结构之间互动关系的“默顿学派”。

2. 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知识行动者建构的科学

20世纪70年代,科学社会学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研究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大批社会学家转为关注科学的知识内容,科学知识社会学得以产生。最初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主要是来自英国爱丁堡学派和一些受欧洲大陆研究传统影响的学者,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卡林诺尔-塞蒂娜(Karin. Knorr-Cetina)等。在他们看来,默顿学派忽略了科学知识本身,错过了很多重要且有趣的内容,因而只是一种“属于科学家的社会学”,抑或是一种“为科学家服务的社会学”,英国学者惠特利(Richard Whitley)将其称为“黑箱理论”^⑤。科学知识社会学要做的努力就是把科学的知识内容合法地纳入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分析科学知识产生的具体过程。科学知识社会学认为科学知识的主导性因素是人类力量而非自然力量,在其视域下,一切科学知识都是被社会建构起来的,或者至少具有社会建构性特征。这样,知识就成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成为相关社会群体互动、协商的结果,作为知识行动者的科学家要做的不是发现科学知识,而是制造科学知识。

3.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社会需要推动下的科学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是科学发展最根本的动力。“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⑥起初,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就是由生产决定的,科学要适应生产的需要,并且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从而为其服务。对此,恩格斯曾在《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中有过精辟的论述:“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却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⑦不难看出,在近代社会中,科学得以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的根本原因,既不是科学家探寻自然奥秘、追求科学真理的主观动机,也不仅是自然科学自身的内在因素,而是基于生产实践的需要,是社会生产对科学不断提出的新需要。虽然马克思、恩

格斯没有排除主体因素对科学活动的推动、社会制度对科学发展的影响以及各种科学之间的相互作用,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生产活动的需要是科学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

由上观之,关于科学发展的动因,科学社会学主要有三种主流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将科学视为一种社会制度,认为科学受到社会中其他相关制度的影响(默顿学派);第二种观点是将科学视为一种社会建构,认为科学是行动者建构的产物(科学知识社会学);第三种观点认为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和社会“需要”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笔者认为,科学自诞生起就具有社会性根源,遵循着一种“社会”逻辑,制度、行动者和需要等社会性因素均以不同的形式影响着科学的发展,而上述三种因素正是本文分析社会工作发展的三个重要维度。

二、制度、行动者与需要:社会工作发展中的三重影响

任何一门科学的产生、发展、变迁都不是历史的偶然,势必受到社会性因素的影响。“科学性”是社会工作不可或缺的要素,成为科学也是社会工作自诞生起就存在的诉求,因而运用科学社会学对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工作进行分析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本文尝试整合科学社会学的三种观点,把制度、行动者和社会需要都视为科学发展的社会性影响因素,在厘清三者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中国社会工作的百年沉浮,探寻其中的影响机制。

1. 制度影响:社会工作发展中的政策推动

社会工作既是一门科学,亦是一种静态的制度结构,故其引入、取消、恢复、发展均与周围的制度安排密切相关。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中国社会工作的百年发展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国家的顶层设计决定着社会工作发展的规模与速度,也决定着社会工作的具体形态。因此,社会工作在我国的发展被学界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⑧。

民国早期,社会工作已由传教士引入中国。1912年,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步济时创办了北京社会实进会,社会工作实务在中国起步。1917年,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创建了著名的“沪东公社”,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在中国发端。1925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更名为社会学与社会服务系,增设社会服务短修科,社会工作在中国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专业。

但当时的社会工作主要由教会大学组织开展,影响力有限,很难全面推广,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国家政策的支持。民国政府社会部成立后,这种状况很快得到改变。《社会服务实施纲要》《社会工作人员训练办法》《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纲要》《特种考试社会工作人员考试规则》等一系列与社会工作相关的政策文件相继出台,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社会工作合法性地位,社会工作逐渐被纳入国家治理框架。^⑨短短几年之中,学术期刊、行业协会、职业规则、实务机构等一个专业所必备的要素一应俱全,社会工作进入一个快速的发展期。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实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的单位制消解了社会工作生存和发展的政策土壤,使社会工作没有了施展的空间。^⑩

改革开放后,社会工作的发展同样基于行政化的政策推动。由于制度结构的改变,社会工作教育在 1987 年著名的“马甸会议”召开后得以恢复。最初仅是有限的几所高校开展了社会工作教育,且当时的社会工作教育是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紧紧围绕着民政工作展开的。对此,有学者指出,社会工作恢复的初衷只是作为一种“培训制度”服务于民政工作的。^⑪虽然 1999 年高校扩招后社会工作教育规模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整体而言,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依然是缓步慢行,实践领域仍属空白,被称为社会工作教育的“单兵突进”^⑫。直至 2006 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后,其发展状态才得以改变。此后,随着中央顶层设计、各部委协同配合政策以及地方实施性政策的密集出台,社会工作在教育、研究、实务等各个方面均取得了实质性突破和快速发展。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社会工作更是大有改观,在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专业社会工作逐渐发展,实践属性和社会转向愈益明显。加之“政府购买服务”公共财政机制的确立,更多社会主体承担起公共服务的责任,这从政策和环境上为社会工作发展提供了支持与保障。可见,制度的改变让我国社会工作教育得到恢复,国家支持性政策的出台使我国社会工作发展迎来了一个真正的“春天”。

2. 行动者的建构:社会工作发展中的多元形塑

作为一门科学,我国社会工作在民国时期和当代经历了两次“西学东渐”的历程,走过了两次“教

育先行”之路。这期间社会工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无疑与一代代社会工作学者的努力密不可分。作为具体的行动者,社会工作学者自身的身份、经历、立场等都影响着他们对社会工作的理解,从而直接影响到社会工作发展,此即社会工作的“建构逻辑”。

民国时期,社会工作的主导力量更换了三个群体,从传教士到留学生,再到政府官员。民国早期社会工作引入的主力是西方传教士。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教会大学,并以社会工作为手段在中国传教,这对社会工作思想、理念及方法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⑬“回收教育权运动”后,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成为社会工作的中坚力量,他们凭借专业的社会工作理论、特有的文化底蕴以及宽阔的国际视野逐渐取代了传教士,开启社会工作“本土化”之路。^⑭社会部设立后,民国政府官员开始介入社会工作发展,社会工作“行政化”色彩逐渐呈现,当时已有学者发文批评民国社会工作协会,认为“团体(社会工作协会)虽成立未久,却因袭了中国整个官僚政治的衣钵,重蹈其他团体覆辙”^⑮。可见,由于行动者身份、经历以及立场的不同,他们对社会工作的理解不同,发展社会工作的动机不同,开展社会工作的方法亦不同。如此一来,民国时期三个历史阶段中社会工作分别呈现“西方化”“本土化”“行政化”等三副不同的面孔。

改革开放后,社会工作逐渐恢复,行动者的身份、经历以及立场同样影响着他们对社会工作的理解,也影响着社会工作的建构。社会工作恢复之初,在教育先行的发展模式下,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主要由中国本土学者、香港学者以及民政部的“学者型官员”这三种群体共同推动。因身份、经历及立场的不同,他们对社会工作的理解也有很大不同。譬如,卢谋华教授坚持“民政工作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的观点,明确指出“民政工作是应用社会学中社会工作的主要部分,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实践基础”^⑯,进而提出自觉将社会工作理论运用到民政领域的论断。当时香港学者的观点则与此不同,他们认为应该注重社会工作的实践性,运用社会的力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⑰当时的中国本土学者则强调:“在社会工作学科建设国际通则面前,应基于中国的文化环境与时代背景,做出自己的选择。”^⑱由此可见,这三种观点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

正是在如此张力之下,我国社会工作走过了 30 余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中国社会工作的当代样态,后续社会工作发展中的行政化、西方化等多种问题均可溯源于此。

3. 需要动因:社会工作发展中的“问题倒逼”

一门科学只有与社会的需要相吻合才能被社会接受,才能得到人民大众以及党和政府的认可。作为一门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性社会科学,社会工作的发展逻辑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社会问题的回应。可以说,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要是社会工作发展的内在动力。质言之,社会工作的发展正是基于一种“问题倒逼”。

社会工作是现代化的必然产物。西方社会早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促使社会救助趋于专业化提升,因而社会工作得以产生。在民国时期,我国社会工作的引入既是工业化、城市化所致,也与列强“坚船利炮”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密不可分。当时,战争、灾荒以及大量贫穷人口的存在导致社会风险增加、社会震荡出现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滋生蔓延。对此,我国传统的助人方式已经无力回应,国家与社会迫切需要社会工作的介入。正是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要推动着社会工作的产生与发展,民国时期社会工作的引入以及后续一系列支持性社会政策的出台皆源于此。

同样,社会工作的恢复亦与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问题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后,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问题日益增多,给社会工作的恢复重建创造了需要的动因和必要的历史条件。进入 21 世纪后,我国经济迅速增强,但长久以来积累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也日益显现,如此情势最终引起社会层面的改革,使国家更加关注社会的发展。基于此,社会工作逐渐走向实务领域,开始社会性转向。当时,社会工作既是现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重要手段^①,也是社会和谐润滑剂^②,可以有效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因此,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后,社会工作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总之,我国社会工作的引入、恢复及发展与国家的顶层设计、制度安排密切相关,也是政府官员、学者、社会精英等实践主体长期磨合、不懈努力的产物,其背后的社会需要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实际需要引导着社会工作的发

展与改变。

三、科学的“社会”逻辑:社会工作发展的影响机制

科学具有多重品格,是一种具有特殊规范体系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关于客观世界真理的知识体系,又是一种人类探求世界客观规律的社会性认识活动。作为一种应用性社会科学,社会工作亦同时具有制度、专业和实践三个层次的意义。^③首先,社会工作是一种制度设置,属于一种社会福利的发送体系,其发展受到国家制度安排的影响。其次,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具有一套科学的知识体系,其发展受到研究者与教育者的形塑。最后,社会工作是一种助人实践,解决社会问题的实际需要是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推力。概言之,制度、行动者和社会需要是社会工作发展的三种影响因素。那么,三者之间是何关系?如何共同作用于社会工作的发展?本文基于制度、行动者和社会需要三种影响因素,建构出了一个“需要—结构”的社会工作发展分析框架,亦即社会工作发展的影响机制。

1. 结构二重性:社会工作发展的直接动力

在“需要—结构”框架中,所谓的“结构”即不断地卷入到社会系统再生产过程中的规则和资源。^④结构具有二重性,制度与行动者是结构中的两个关键性变量,影响着社会工作的发展,决定着社会工作的现实形态。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系统,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正式制度抑或非正式制度的支持,尤其是当社会工作还没有跃升到社会价值体系之中,还没有获得一个受人尊敬的专业地位之时,更是如此。因为那时社会工作许多重要选题不是来自自身的逻辑需要,更多的是依靠社会的安排。此外,任何一门科学的产生与发展都需要行动者的建构。科学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创造科学、推动科学发展的行动者是社会中的个体,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会受到社会 and 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以及传统文化的左右,从而使他们无法超越其生活的时代和社会情境。因此,社会工作在其发展过程中亦受到行动者的形塑,行动者总是同其所处的社会体系相互作用,使自身的社会属性转译到社会工作发展之中,从而导致社会工作呈现出不同的外在形态,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行动者与制度安排也交织在一起,

二者相互影响,共同影响着科学的发展形态。实际上,社会工作正是在不断回应变动着的社会现实这一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制度结构和行动者虽然会影响社会工作的发展,但这二者更多地体现在对社会工作的现实样态和发展速度产生直接影响。故而,笔者称之为社会工作发展的直接动力。

2. 社会需要:社会工作发展的内在动因

“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②③}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学的经典命题。其中,所谓的“需要”主要是指生产的需要和经济的需要,所谓的“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同样,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其产生、发展乃至消亡也与“需要”息息相关,只是这里所谓的“需要”另有所指,各有不同。

社会工作是一门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性社会科学,主要是“社会性”地提供专业服务,帮助个体、群体解决困扰,回应社会问题与社会需要。^④因此,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的内在动因主要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需要”。社会服务领域个体需要的不断提升为社会工作专业化提供了动力源泉,而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需要成为社会工作发展的合法性基础。当下,我国社会发展中专业化、个性化社会服务的需求量仍然较少,对社会工作的专业性要求尚存不足。^⑤故而,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内在动因尚有欠缺。

总体而言,社会工作发展中的制度安排、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以及行为者的建构等只是在表面上改变社会工作的具体形态并影响社会工作的发展速度,而决定社会工作发展方向及规定着社会工作发展方式的内在动因是解决实际问题的社会需要。

3. 需要—结构:社会工作发展的影响机制

如上文所述,“结构”逻辑是奠定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对加快科学的发展步伐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而“需要”逻辑是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因,不断为科学发展注入合法性动力,引导着科学不断前行。作为一门科学,社会工作的发展受到结构性(制度和行动者)因素的直接影响,而社会需要则是社会工作发展的内在动因。社会需要不可能直接作用于社会工作的发展,也不可能决定社会工作发展的具体策略,但社会需要可以通过结构(制度和行动者)这一中介变量对社会工作的发展产生影响。具体而

言,社会工作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种“社会需要—制度和行动者—科学(社会工作)”的影响机制(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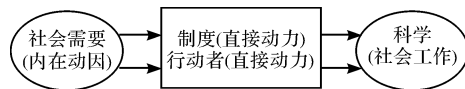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工作发展影响机制图

由图1可见,社会发展中解决社会问题的实际需要给予了社会工作生成和发展的现实空间,这是社会工作发展的必要条件。此外,社会工作的发展势必受到结构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社会工作的百年发展历程正是在“需要与结构”的张力下得以展开,也正是二者的交互作用造就了社会工作的诸多形态,二者合力推动了社会工作的百年发展。当社会需要和社会结构相吻合时,社会工作会得到快速、持续的发展;当二者相互抵触时,社会工作则处于茫然与消退的状态。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存在着不同的社会问题、不同的社会矛盾、不同的社会福利要求。或言之,每一种“结构”下对社会工作的“需要”有所不同。因此,社会工作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其亦面临着一个“处境化”的问题^⑥,即每一个城市中的社会工作概念,每一个领域中的社会工作概念以及城乡之间的社会工作概念都有所差异。我们应跳出“专业社工是最有资格从事社会服务”的迷思,秉持开放包容的“大社工”理念^⑦,形成一种与社会需要相对应的社会工作结构,建立不同的社会工作制度,由不同的社会主体来承担不同的社会工作服务。

四、结语

在需要与结构的张力之下,社会工作已在我国走过了百余年的历程。纵观百年历程,中国社会工作经历了数次跌宕起伏,走过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横览全国各地,中国社会工作形成了多种发展模式,具有不同的理想类型。这可归结为制度、行动者、社会需要等社会性因素之间的互动,也即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受到“需要—结构”的影响,遵循着一种“社会”逻辑。

诚然,科学的发展势必受到社会性因素的影响,但科学自身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它具有一种以普遍主义为核心的社会规范、一种以“同行承认”为实质的奖励制度、一种以“精英统治”为特点的社会分层、一种以“无形学院”为中心的学术交

流方式、一种以研究成果质量为基础的科学评价系统,等等。^③所有这些构成了科学这样一个自我支配、彼此独立、不受外部理论控制的完善系统。因此,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其独立的规范结构和内在的发展规律,即科学的自主性。科学的自主性是科学在适度依赖社会和接受社会控制条件下所应享受的自由,决定着科学的生存抑或毁灭。^④当下,我国社会工作处于一种依附式发展状态,其自主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遮蔽。笔者认为,作为一门应用性社会科学的社会工作遵循着一种“社会”逻辑,同时也绝不能忽略其“自主性”的存在,应做到一种“社会”逻辑中的“自主”。关于社会工作的“社会”逻辑,本文已经做了详细的论述,而社会工作如何实现科学的“自主”亦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议题,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文详述。

注释

①刘振、徐永祥:《历史分期与理想类型:中国社会工作百年兴衰的历史考察》,《学术界》2019年第5期。②[美]伯纳德·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顾昕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中文版序言第3页。③[美]罗比特·K.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吴忠、蒋效东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19—320页。④[美]罗比特·K.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上册),鲁旭东、林聚任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4页。⑤Richard Whitley. Black-boxism and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Sociological Review*, 1972, Vol.18, No.2, pp.61-92. ⑥[德]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于光远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3页。⑦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48页。⑧葛道顺:《我国社会工作制度:变迁中的建构》,《东岳论丛》2012年第10期。⑨张岭泉:《“国家—社会”视野中的民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社会工作》2012年第10期。⑩田毅鹏:《转型期中国社

会原子化动向及其对社会工作的挑战》,《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刘振、徐永祥:《历史分期与理想类型:中国社会工作百年兴衰的历史考察》,《学术界》2019年第5期。⑪刘振、徐永祥:《中国社会工作的生成路径与发展困境——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天府新论》2017年第5期;刘振、徐选国:《从专业性、社会性迈向学科自主性——新时代我国社会工作学科建设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转向》,《学习与实践》2020年第1期。⑫侯利文:《教育先行抑或实践引领:再思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社会工作与管理》2020年第1期。⑬孙志丽、张昱:《中国社会工作的发端》,《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⑭刘振:《试论留学生对民国社会工作教育本土化的贡献》,《社会工作》2013年第4期。⑮吕珩:《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社会导报》1948年第20期。⑯卢谋华:《民政工作专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7—34页。⑰宋陈宝莲、阮曾媛琪:《“社会工作实践中心”对社工教育学院与社会服务机构合作发展社会工作服务之经验反省》,《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⑱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17页。⑲徐永祥:《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重要手段》,《河北学刊》2007年第3期。⑳张昱:《社会工作:由个体自身和谐通向社会和谐桥梁》,《河北学刊》2007年第3期。㉑夏学銮:《社会工作的三维性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㉒[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38页。㉓徐选国:《从社会学的想象力到社会工作的想象力——社会工作学的逻辑起点初探》,《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㉔童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困境与本土道路》,《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6期。㉕何国良、王思斌主编:《华人社会社会工作本质的初探》,八方文化企业公司(香港),2000年,第114—137页。㉖赵环:《社会工作的实践迷思及其范式转型》,《学海》2016年第5期。㉗马来平:《科学的社会性、自主性及二者的契合》,《哲学分析》2011年第6期。㉘马来平:《科学自主性与科学素质传播》,《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责任编辑:海玉

The Social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Liu Zhen

Abstract: It has been a hundred years since social work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which has experienced several ups and dow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of science to study the changes of social work in the past century, the system, actors, and social needs can be regarded as thre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a "need-structure" analysis framework of social work development can be constructed, that i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social work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is directly affected by structural factors (institutions and actors), and social needs are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It is under the tension of "need and structure" that social work develops in the past century. When the social needs and social structure are consistent, social work will get rapi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en the two contradict each other, social work will be in a state of confusion and decline.

Key words: social work; scientific sociology; need-structure